

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

王锦民 著

中华书局

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 古典目录学与学术史 / 1
- 一、文献、学术与目录 / 1
- 二、古典目录学的体制与功用 / 7
- 三、古典目录的主要类型 / 12

第二章 刘向、刘歆的功绩

- 文献传统的起源与目录学的奠基 / 17
- 一、文献传统的起源 / 17
- 二、秦汉之际的典籍聚散 / 25
- 三、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 / 30
- 四、学术的源流与格局 / 36

第三章 《汉书·艺文志》(一)

- 《六艺略》与经学传统 / 39
- 一、班固与《汉书·艺文志》 / 39
- 二、《易》学的传统 / 43

三、《书》学的传统 / 47

四、《诗》学的传统 / 52

五、《礼》学的传统（附《乐记》） / 56

六、《春秋》学的传统 / 59

第四章 《汉书·艺文志》（二）

——诸子、诗赋及其他学术 / 64

一、诸子出于王官说 / 64

二、儒家诸子 / 68

三、道家诸子 / 72

四、阴阳、法、名、墨、杂 / 75

五、诗赋 / 78

六、兵书、数术、方技 / 81

第五章 《隋书·经籍志》（一）

——四部分类与正史艺文志传统 / 86

一、魏晋六朝目录学的发展 / 86

二、《隋书·经籍志》的结构与主旨 / 91

三、四部分类与学术的分合 / 95

四、正史艺文志的传统 / 97

第六章 《隋书·经籍志》（二）

——自东汉到六朝的四部学术演变 / 100

一、经部学术之演变 / 100

二、史部学术之演变 / 106

三、子部学术之演变 / 110

四、集部学术之演变 / 116

第七章 佛录传统的莫立

- 佛经翻译与晋唐佛典目录 / 120
- 一、佛经翻译小史 / 120
- 二、汉文佛典的自立 / 126
- 三、传统目录对于佛教文献的著录 / 131
- 四、佛典目录的创始与集大成 / 137
- 五、大乘经五大部 / 148
- 六、中土撰述 / 154

第八章 大藏经与佛藏提要目录

- 大藏经刊印、提要目录及佛录的优长 / 158
- 一、入藏目录与大藏经的刊印 / 158
- 二、佛藏提要目录 / 160
- 三、佛录与佛学之源流 / 165
- 四、佛录的优长 / 170

第九章 道藏之广纳百川

- 道藏目录体系与道学源流 / 173
- 一、道教、道藏与目录 / 173
- 二、三洞、四辅、十二类 / 183
- 三、道书目录举要 / 202
- 四、道学源流 / 206
- 五、道藏之广纳百川 / 212

第十章 从《崇文总目》到两解题

- 宋代的目录与宋学流变 / 216
- 一、传统目录学的沿革 / 216
- 二、《崇文总目》 / 221

三、《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 225

四、尤袤《遂初堂书目》/ 233

五、宋学的产生与流变 / 236

第十一章 会通与辨章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 / 247

一、《通志·艺文略》与《校雠略》/ 247

二、郑樵的学术与目录学思想 / 257

三、《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 262

四、博雅与专门 / 266

第十二章 《四库全书总目》(一)

——传统学术与文献的集大成工程 / 274

一、《四库全书》/ 274

二、《四库全书总目》/ 278

三、《四库全书》相关目录 / 287

第十三章 《四库全书总目》(二)

——儒藏与固有学术的格局与源流 / 289

一、《四库全书》是儒藏吗? / 289

二、类序中的学术史 / 293

三、辨伪与辑佚 / 300

第十四章 学中第一紧要事

——清人治学目录举要 / 307

一、明清目录学概观 / 307

二、朱彝尊《经义考》/ 311

三、钱曾《读书敏求记》/ 314

四、周中孚《郑堂读书记》/ 316

五、李慈铭《越縠堂读书记》/ 319

六、龙启瑞《经籍举要》/ 323

七、张之洞《书目答问》/ 326

余 论 / 333

主要参考书目 / 336

第一章

导 论

——古典目录学与学术史

一、文献、学术与目录

首先开宗明义，凡是从事国学研究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跟自古以来的文献打交道，而文献所蕴含着的，则是学术，使文献与学术之间建构起有机联系的，则是目录。文献、学术与目录三者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可以形象地比作国学这尊大鼎的三足。

什么是文献？这是一个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基本概念。对于文献概念的理解，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的角度说，文献概念与史料概念大体相当。所谓史料，可以分三大类：一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关于人类生存的一切物质遗存（遗迹、遗址、建筑、器物、工具、服饰等等）；二是文字和图像记载（公私文档、经籍、史传、神话、文学、石刻、图画等等）；三是口传的言语生活材料（礼俗、传说、师传、演唱、方言等等）。这三大类史料一定与人类生存有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国学所关涉的历史不是自然的演变过程，而是人类基于精神目的而进行的选择与创造的历程。史料本身即是一种意义载体，具有历史记忆功能，在经过周密的外部考证与内部考证之后，它能够透露出客观的、有意义的历史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过去的年代中人们所经历的物质生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基本状况。

不过，在国学研究中使用文献这个概念，大多是从狭义的角度说

的。要得出狭义的文献概念，需要对广义的文献概念做两层限制。首先一层限制，诸如物质遗存和图像类的历史材料，通常被划归到考古学、博物学之中，而不在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这样一来，文献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以语言方式存在的历史材料，既可以是书面的语言文献，亦可以是口传的言语文献。这样的文献，与古代文献的本义是基本相合的。“文献”一词源出自《论语·八佾》，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注释云：“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也。”文献一方面指文献典章，另一方面指耆贤口传之故事。其次一层限制，对于以语言方式存在的流传文献，也有学者做了进一步划分，认为其中只有那些传世的、发挥过重要文化影响的典籍，比如儒、道、释的经典、诸子百家、二十五史、历代诗文之类，才是核心的、正统的文献，其余的则是边缘的、非正统的文献。这种看法并不是只保留正统的文献，而摒弃非正统的文献，而是分出中心与边缘。这种对文献的看法，本身亦是自古相沿的正统观念的体现，按照这种正统观念，国学的最重要的文献，就是那些被收录在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藏与道藏中的书籍。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的确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自始以来就与学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设想，古代历史中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各种文献，而在当时看来，这些文献的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有一些文献被有意识地保存并传承下来，有一些文献则任其自生自灭了，而在其中发挥着评鉴、选择与建构作用的，即是与文献并行发展的学术。

那么，在国学的意义上说，学术又是什么呢？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给中国之学术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不足以应用于术，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

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1〕

在梁氏看来，学与术都是人类探索自然与社会奥秘的某种活动，均以真理为鹄的；学与术的关系就像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一样，可分而不可离。不过，尽管梁氏之说曾经发生过很大影响，却未必与中国古代的历史情况完全吻合。因为他基本上是顺着西学的路向，把学术仅仅看作是一种知识形态，而忽略了学术赖以建构的政教基础。学术不是抽象地存在着，它隶属于国家的政教体制，就像一棵大树，地表以上枝繁叶茂，地表以下也是根脉纵横。中国古代学术从产生伊始，就有政教化的特点。就上古学术的起源来看，学与术的发源地是不同的，学发源于古代的学校，术发源于古代的官守，故而前者侧重于贵族的道德理想教育，后者侧重于官吏的各种专门技能的培养。即便从知识的角度说，一开始也是并行的两套东西，是到了后来才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学与术各有其政教发源地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学术的内涵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学术不能被看作是单纯的知识形态，在考察其作为知识形态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支撑着该形态的政教体系。

中国学术是国家政教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的学术即是学中之术，它与创造、职掌与传授学术的学校与官守体制是合为一体的。经过相当长的历史之后，学术才逐渐打破官府的垄断，开始有官学、私学之分。最初的官学与私学的区分，是指春秋时代学术与教育从由政府及贵族垄断，到散落到民间，并惠及庶人。孔子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创办私学的第一人。自孔子之后，各诸侯国民间兴学之事层出不穷。不过，先秦的早期官学并没有就此衰亡，而是经战国蛰伏之后，在汉代发展成庞大的学校系统。汉代之后的官学主要指由朝廷和地方官府兴办和管辖的学校，又可以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官学系统逐步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度。孔子之后的私学则一直与官学并列发展。汉代的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开门授徒。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

〔1〕 参见梁启超《学与术》一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第723~72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也多靠私学传授，才得以流传。特别是宋代以降，民间书院风行于世，逐渐演变为影响力巨大的私学教育机构，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都是通过书院讲学来创说立派、传播其学术与思想的。

古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就其起源而言，它就是为政治服务的，甚至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形式，因此注定要以体现国家意识形态为基本宗旨。另一方面，学术中所包含的主体的创造性、自由思想与知识因素，使其不完全屈从于政治要求，因为从学术的本质来说，应该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随着创造性、思想与知识的逐步增长，在学术中孳生出了一种使自身趋于独立的力量，力图使学术摆脱政治的影响，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活动。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古代传统中的学统、道统之分。所谓学统，即是作为国家政教组成部分的学术的传统，它通过制度化的学校体系发挥作用并沿革下来。所谓道统，主要是相对自由的思想与知识的传统，它基于历代圣贤对于至高无上的道的认识与体验而薪火相传。学统与道统是交错的，保持相对独立，在某些情况下，道统可以被包容在学统当中，学统和道统可以相一致；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学统和道统又是并行的，甚至可能会出现对立的状况。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考覈的官学与私学、学统与道统两对矛盾，都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题中之义，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呈现为不同的相互关系，既有对立，又有统一，从而使古代学术在多元的张力作用下向前发展。要全面了解古代学术的发展，仅凭考察这两对矛盾，显然是不充分的，但是它们的确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因素。

中国学术所具有的政教化的特点、思想与知识的多重内涵，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运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献的选择与评鉴。文献的产生，有些是独立于学术体制之外的，而后为学术所收容，也有一些就是在学术体制之中产生与流传的。文献与学术的分合关系，在历代的目录中比较清楚、系统地体现出来，或者说，目录就是文献与学术的结合点，通过目录一方面可以了解文献的产生和累积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了解相应的学术的发展情况。

关于中国古代的目录学，有必要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献与学术双重内涵。说到目录，首先让我们想到的就是关于书籍的登记，认为目录即是按照一定的体例编排而成的书目系统。就中国古代目录学来说，“目”是指书籍的篇卷名称，“录”则是指对书籍的内容、作者、版本、类别与大义的简要说明。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曾经综合古代目录学的各家论述，为目录学下过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

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1〕}

这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又不免有些含混的定义。其中“部次甲乙”，即是按照某种分类法，将书籍登记在册，这是最典型的目录学工作；“条别异同”，则是考核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这是校雠学的工作；这两者都是基于书籍的外部特征进行的。在这两者的基础上，还要“推阐大义”、“疏通伦类”，这些都是对书籍内容的把握，不仅仅是从书籍的外部特征着眼。而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基本宗旨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句话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总结出来的，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精髓，素来为学者推重。清代学者朱一新也说过，目录学的“本”在于“商榷学术，洞澈源流”，而“多识书名，辨别版本”尽管也是必要的，但是相对来说只是目录学的“末”，朱氏说：

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2〕}

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曾经说：

〔1〕 参见姚名达《目录学》，第9页，《民国丛书》第一辑47册，上海书店影印版。

〔2〕 参见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张舜徽所编《文献学论著辑要》，第34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1〕

“目录之书”而兼“学术之史”，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最突出、最优良的一个特点。至于姚氏定义中的“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则主要是说这样的目录之书所能发挥出来的功能，后学者可以根据目录而通晓文献与学术的门径，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基本宗旨呢？或者说，如何才能使“目录之书”具备“学术之史”的性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一下古代目录学所运用的方法论的性质。

按照余嘉锡的看法，“目录之书”中包含有“学术之史”。我们先做这样的推想，最初的目录编制工作，很可能采用的是归纳与综合的方法。目录的编制者面对杂乱无章、堆积如山的书籍，先是一本地仔细地审阅、校讎，推究其大义，然后按照其内容和文体的异同加以归纳，从而分出各层次的大小类别；而后编制者再将这些类别进行综合，排成具有学术意义的序列，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目录系统。目录的编制者面对的是客观的文献集合，而通过对客观的文献集合的归纳与综合所得到的目录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恰好是文献集合中所蕴涵的学术体系的体现。

这样的推想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归纳与综合的方法，很容易受到文献状况的局限。如果作为归纳与综合的对象文献集合是完全的，处在理想状态，那么上述推想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文献集合是残缺的或有偏颇倾向的，那么上述推想就很难成立。因为基于残缺的文献集合依然可以编制出目录来，但它所反映出的学术体系必然也是残缺的，这样一来，“目录之书”所具有的反映“学术之史”的功能不免要大打折扣了。

〔1〕 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我们再做另一种推想，目录的编制者是一位精通古今学术的学者，在他进入藏书室，接触那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之前，已经在头脑中有了一张古今学术的蓝图。对于他来说，编制目录与其说是对既有文献进行一番归纳与综合，不如说是拿一个早就预设好了的学术框架来套这些文献，使原本如一盘散沙的文献，按照某种特定的学术理想，被编制成一个整齐的、各类别有机关联的体系。从方法论的角度说，这是一种建构性的方法，它是在充分了解文献客观状况的基础上，再以一个学术理想来衡量与规范文献中所包含的学术，这样一来，即便面前的文献是残缺的或者偏颇的，依然可以通过预设的理想因素来加以补足，使之呈现出一幅完整的学术图景。特别是涉及到文献的评价时，目录的编制者并不是以相关文献的多寡或版本优劣来排坐次，而是超出目录学的范围，以编制者个人或所在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标准，来确定文献的尊卑主次。

以上设想的方法论上的两个向度，并不一定势同水火，不能并存，甚至说，它们都是目录学必不可少的，它们可以通过辩证思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因为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辩证关系，才使得文献、学术和目录达成三位一体，在目录中体现出文献与学术的完形互补。中国古代的优秀目录，必定是既能客观地反映文献的基本情况，又能充分反映编制者个人或所在时代的学术理想的目录。

二、古典目录学的体制与功用

中国古代的目录之所以能兼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的功用，是由其独特的目录体制决定的。

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从体制上区分了三类目录，余氏说：

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昔人论目录之学，于此三类，各有主张，而于编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则无异议。^{〔1〕}

〔1〕 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4页。

余氏又说：

属于第一类者，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1〕

书名、部类、小序与解题，都是构成目录体制的基本要素，它们都有独特的学术史功用。即便是只登记书名，如果类例编制得当，构成合理的部类，也能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其实目录学最基础的层面就是类例，所谓类例，就是分类的原则。古代目录除了极少数使用没有意义的分类法，比如按《千字文》分类，大多数分类都是合乎学术原则的。因此，一个古代的目录类别，恰好就是古代的一个学术分野。就像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这种相合，既可以看作是对于历代文献进行归纳与综合的结果，也可以看成是按照某种学术理想来建构性地规划文献。在类例的制定中，已经具有了很明确的学术史意识。宋代的郑樵甚至认为，一部好的目录，不需要有小序和解题，只要制定好类例就足够了，类例的划分其实就是学术的划分，每一类即是一种专门之学。类例既分，则学术自明，其先后本末，都会在目录中得到必要的揭示。郑樵在《通志·校讎略》中说：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书籍之亡者，由于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2〕

〔1〕 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14页。

〔2〕 参见郑樵《通志·校讎略》，《通志》卷七十一，《万有文库》本。

通过类例，将繁多的书籍划分成一个个部类，这些部类相应于各种专门之学，每种专门之学又各有其先后本末。即便某一类的书籍在流传中有所亡佚了，也可以通过其类例，推想其原有的学术规模。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靠部类中书籍的排列，还难以尽发其义蕴，因此需要在部类之下，再加上小序，也称为类序，来概括说明这一类书，或者说明与这一类书相关的学术的本质特性和历史变化。通常在目录书中，各部之首冠以总序，作用在于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部下的各类之首冠以小序，作用在于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1〕。小序是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对于某一部类之书以及相关之学术的说明，对学术的起源、演变、流派与兴衰，相关的历代文献聚散，均有清楚系统的论述，故而学术史的特性最为突出。

至于解题，则是就部类中的某一书而专门做的提要，是隶属在书名之下的。提要会比较全面地说明该书作者的生平与学术、著作年代、版本流变、真伪存佚、该书在整个部类中的地位，以及相关学术的宗旨和源流等等。例如《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撰写体例：

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2〕

我们很容易发现，从书名到部类，再到小序、解题，就像是一座层垒而起的建筑，附加到目录上的学术史内容越来越多。每上一个层次，学术史的功能就增强一步，其中尤其以小序为学术之枢纽，在三者中最为关键。这样一来，一部“目录之书”逐渐演变为一部“学术之史”。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既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很强学

〔1〕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武英殿本。

〔2〕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术史特性的目录书，也可以看作是以目录书形式写作的学术之史。

历代的目录学家均已注意到这种体制完备，兼有书名、部类、小序与解题的目录所具有的学术史功能，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将之概括为六点：

一、述作者之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隋书·经籍志》）

二、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毋煨《古今书录序》）

三、一书大义，为举其纲，书有亡失，览其目录，犹可想见本末。（朱彝尊《崇文总目跋》）

四、品题得失，藉以求古书之崖略，辨今书之真伪，并核其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五、择擅群艺，研核臧否，为校雠之总汇，考镜之渊藪。（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

六、阐明指要，资学者博识。（王先谦《郡斋读书志叙》）〔1〕

这些都是古人精研目录学的心得，弥足珍贵。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兼具学术史功能的目录学仍然是非常有用的。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文献考证。研究一个专题，先要确立与此专题有关的主题文献，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几种。对于这些主题文献必须做严格、彻底的考证，以保证它们是客观的、可信的。很多文献本身已不是第一手历史材料（原料），而是一种史家创作的历史记述。出现在这些历史记述中的史料，已成了第二手材料（次料），需要重新考索其史源。著名史学家陈垣为此专门创设了“史源学”一门，即对前人著作中的历史记述做还原式的考证，彻底查出其史料来源，然后评价其价值，订正其讹误。考索史源一定要回溯其所涉及的原始文献，这种回溯是沿流讨源，必有一个可行的路径，目录学恰好能提供这种路径的指引。在“史源学”方面，目录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1〕 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8页。

其次，目录学有助于我们进行文献整合。在研究一个专题的时候，除了主题文献之外，一定会涉及一系列的相关文献，从而使一个单一问题被放置到一个整体背景之中。如何将基础的主题文献和广泛的辅助性文献合理地整合在一起？或者说，如何确定围绕某一问题的文献关联是充分的、周全的、没有不被允许的疏漏呢？在这种情况下，目录学可以揭示出传统学术中的一种专门之学的基本界域及其内外的相关性，就像迷途中获得了一幅地图，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自己的位置，并指示四周的道路情况。今天的中国学术已经按照西方的学术体系分割为文、史、哲之类的各种相互独立的学科，这些孤立的学科并不是中国学术的固有形态，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学术固有的学术分野是体现在古代的目录分类之中的。

再有，目录学还有助于我们进行文献拓展。大多数传统目录书都是以著录正统的文献为主的，同时也会著录一些边缘性的文献。而清代以来，学者越来越重视拓展文献的范围，在利用各种官书、正经与正史的同时，还会援用杂史、诗文集、金石碑版和谱牒等等以作为新的史源。进入20世纪，甲骨文、金文、简帛、敦煌遗书和明清档案等新史料的大量发现，更使得今天的学术研究必须“预流”，才能实现创新和发展。陈寅恪尝说：“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也。”〔1〕要做到“预流”，需要先做一番细致的目录学考证，使新发现的史料能恰如其分地嵌入到历史传统中，然后才能得以合情合理的利用。新史料的发现，逐渐促成了一大批新的目录书的出现，它们和传统目录书既有联系又有变化。

三、古典目录的主要类型

著名目录学家汪辟疆在《目录学研究》中提出了“四家目录”说：

〔1〕 参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